



强侵略屡战屡败，致使国家主权与利益蒙受巨大屈辱。换言之，《辛丑条约》并非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唯一事件。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第一次被外国军队打开国门。从那以后，对于这个封建王朝的最终灭亡而言，都经历了哪些关键而又沉痛的事件和节点呢？当我们寻求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又应当从哪些层面进行考量？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相对悲剧的近代史，可以概括为“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而每一场战争其实对于清朝末期的命运来说都是关键节点。每一次战败后，都有宝贵的时间窗口去使自身强大起来，政权内部肯定也有人想要摆脱这种被欺辱的局面。但是这些宝贵时间窗口中发生的改革、变革，都是艰难且难以落到实处。它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给接下来进一步走向失败埋下隐患。

想要解释其中的缘由，其实也就涉及清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萧功秦表示，从“文明”层面看，这与近代中国难以突破传统的大一统专制体制与农耕文明有关。

“在西方一些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推演：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与一个分散、自治、地方相对独立的封建帝国相比，看起来前者更容易在国家遇到挑战时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的推论里，专制帝国的皇帝掌握绝对权力，只要他愿意推行改革，那么一道圣旨颁布，下面的臣民不得不服从，这样改革就很容易推行。然而，从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推论却与现实相反。”萧功秦说道。

在他看来，如果从文化与文明角度分析，由于两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层始终受到儒家道统的深刻影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一种追求“整体抑制个体”、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这种文化长期以来讲究“克己复礼”，从而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久而久之，决策者生活在一个受儒家道统影响的极度封闭的政治环境之中。由于缺乏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又缺少足够的兴趣、动力，使得他作为唯一的权力核心，反而在改革面前是最难作出改变的对象。萧功秦对此解释：“可以理解为，这种讲究‘克己复礼’的儒家文化，在过去是支撑这个



清末，简陋的烟榻上总是横满了吸食鸦片的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长期存在的根基，但是它也在近代影响了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的常识判断。因为道统是他们判断问题的准则，而道统又是保守的。”

换言之，这是古代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以来改革过程中的掣肘。

由于始终未能突破这种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文明，清王朝在其他领域也因此面临诸多矛盾、弊端。譬如人才方面，萧功秦曾在《中国为何没能突破农耕文明？》一文中分析，中国在隋唐以后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但这种考试成功标准，并不是让考生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而是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正因如此，中国的集权文明，其内部选拔的人才，宛如城头上的砖块，而砖墙式的个体缺乏生命力和创造力。

关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更提出，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治理之责。因为上述所提到的以平争混乱为本位的专制文明，长期压抑了个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当国家面临现代化转型时，显然已经缺乏相应的人才。

而作为对比，近代日本虽然也是封建社会，但其社会结构更加分散。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社会，拥有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多元的、自治的藩国。如此一来，在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整

危机促成了迟误的改革，迟误的改革在危机压力下愈发加大幅度，从而又进一步导向更深重的危机。

